



從面試開始認識Dr. Lee

黃麗君

李金銓教授榮休紀念

黃麗君，1984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，主修新聞與傳播學。歷任《東方日報》記者、《南華早報》記者及政治編輯。現職公共事務顧問。

第一次見到Dr. Lee，不是在課室，而是在面試室，他是我報考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時的學系主考教授。當年完全不知道讀大學是甚麼一回事的我，見到這位和藹可親的主考官，不但沒有架子，而且還笑意盈盈地問我問題，我也就膽大大的有問必答，直話直說。

現在已不記得面試進行了多久，只記得Dr. Lee第一條問我的問題，是我每天看甚麼報紙。當時的我，還未知大學校園的人主要都是看《明報》、《南華早報》等精英報章，而只知老師問甚麼，懂得答便直問直答，於是很快對老師說自己每天看的是一份大眾化報紙。老師沒有問我為甚麼不看《明報》、《南華早報》，接著便問我一些有關時事的問題。面試完後，過了不久，便接到大學通知取錄了我。到了入讀中大，才從同學口中得知《明報》是校園讀物，讀新聞系似乎是要必讀《明報》的。老師沒有因我不是閱讀精英報紙去質疑我的水平，對當時的我來說，是一個很大的鼓勵。

遇到一位好老師，可以改變一個人的一生。這句說話，對我來說，是特別適用。在中大畢業後，我第一份工作便是去當記者。到了今天，當記者的那一段日子，仍然是我工作生涯中，最快樂、最有工作滿足感、也是最刺激的一段歷程。而我當年選擇當記者作為第一份職業，也是緣於從Dr. Lee的言教、身教的啟發，才作出這樣的選擇。

其實我沒有正式選過Dr. Lee的課，他教三年級同學傳播理論，我班在二年級已經上這一課，由訪問學人Professor Alex Edelstein Professor Edelstein 跟Dr. Lee「老友鬼鬼」，在學期中，他邀請了Dr. Lee來客座講一課，在那時，我是真真正正的第一次重遇Dr. Lee，而且是在課室裡再見面。當時覺得這位老師，講課趣味盎然，令我對傳播理論多了好奇心，希望知多一點。也因為這一課，之後得到一個機會，在Dr. Lee離開中大，遠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當教授之前的暑假，做了他的研究助理兩個月。

在那兩個月做Dr.Lee助理的日子，讓我有機會涉獵了不少傳播研究的文獻，也經常有機會與他討論相關的議題和理論，擴闊了我對傳播學、新聞學的認識，實在是獲益良多。當年兩篇我看過的文獻，Gaye Tuchman“*The Exception Proves the Rule: The Study of Routine News Practice*”，以及Tuchman另一篇期刊文章“*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: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’s Notion of Objectivity*”，成為我日後寫畢業論文的骨幹。當年的研究主題是中英雙方就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首七輪談判的報章內容分析，研究的主題便是客觀報道和不被報道的事件，如何反映報章立場等議題。這一篇論文在呈交前，也讓遠在明尼蘇達的Dr. Lee過目，老師在百忙中仍然給我意見，對他這一份關顧和厚愛，至今不忘。

除了寫成了一份論文，為我取得學業成績外，也因為這一份從籌備到完成橫跨大學三、四年級的論文功課，令我深深被新聞採訪工作所吸引。畢業後，便選擇當記者，開始了我「鐵腳馬眼神仙肚」的生涯。而初當記者時，跑的新聞已經包括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，第三天上班便是採訪當



與CC、舊同學及職員參加50周年院慶。

時從北京與中方談判後回港的港督尤德爵士，對一個報業新丁來說，這是極為難得的機會。我在報業的工作，便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開始至1997年香港回歸後。回望過去，我這一段老記生涯的起點，並不在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，而是始於我與Dr. Lee討論文獻的那一個暑假，當天播下了對跑新聞的好奇心的種子，日後當記者便是開花結果。當年Dr. Lee給我的學習機會，為我投入傳媒專業奠下了重要的軌跡。

事實上，Dr. Lee對我的啟發，不單在於我的論文研究上，也在於與他時常討論問題時體驗到。有一回，他說到當記者、做研究，要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，這一個教誨，我終身不忘。在我當記者的不同階段，以至今今天我當公共事務顧問的工作上，這兩句說話都是一個重要的提點，畢生受用。

三十多年來，與Dr. Lee亦師亦友，縱使我們不常見面，但老師的身教、言教，從未忘記。他對新聞研究工作的嚴謹和熱誠始終如一，對我來說，是最好的榜樣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他離開中大，是作為學生的我們的最大損失。今天，他因退休而要離開香港，作為學生，我們都會依依不捨。較早前，當我邀請他離港前飯聚時，我說“Before you leave for good”，老師說 “Not ‘for good’ I hope”。台灣跟香港只是一個海峽之隔，我們都希望老師不是真的離開，香港已經是他第二個家，我們希望他不過是轉換一個生活基地，從香港搬到台灣。我們希望他仍然經常回港，為香港的新聞傳播研究工作，繼續出力。Dr. Lee說“Not ‘for good’ I hope”，作為學生的我們，也會說“We hope too”！